尋找批判的和開放的歷史精神

La xul

今天,當中國知識份子力圖通過重構歷史來尋求創造新文化要素時,我認為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第一種傾向是把「重寫中國近現代史」簡單化為重新評價,甚至淪落為價值逆反。通過慘痛的經驗,發現再不能用簡單化的「革命」、「規律」等觀念來把握歷史時,其反面如「告別革命」、「無規律」同樣不能準確地理解歷史。第二個傾向是歷史敍述「以中國為中心」,潛含着中國特殊論,排斥所有普遍理論,這會把中國歷史從世界歷史中孤立出來。

在1990年本刊創刊之始,就開設了「百年中國」一欄,期待重新審視百年來中國人走過的路,並引用歷史學家卡爾(Edward Hallet Carr)的話:「沒有未來意識就不會有歷史」。當時響應者尚不多,「重寫近現代史」主要吸引一些專業學者。五年來,「百年中國」一直是本刊重頭欄目,並得到學術界大力支持,成為學術文化界頗為時尚的口號。今天,當中國知識份子站在已被解構的理想和過時史觀的廢墟上,力圖通過重構和重新評價歷史來尋求創造新文化要素之時,我認為有兩種傾向值得提出來討論。

第一種傾向是把「重寫中國近現代史」簡單化為重新評價,即將過去肯定的 判斷全盤顛倒,重評淪落為價值逆反。例如自清末鄒容的《革命軍》一書風行以 來,革命一直是中國近現代無人敢否定的道義,一些學者重評百年中國就將這 一價值反過來。又例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歷史發展有規律,社會由低級向 高級演化:決定論的解構使人反過來相信歷史發展無規律、無目的、無模式可 尋,歷史進程決定於偶然事件和個別人的觀念變化。上述兩種價值逆反判斷綜 合起來,結論就成為:中國近代史是一系列錯誤。似乎只要我們的先輩思想不 那麼激進、不進行那麼多革命,中國現代化進程就會快得多。

其實,在人文和歷史領域中,事物所遵循的邏輯同日常生活中非此即彼的 經驗是不相同的。深刻真理的反面仍然可能是真理,而淺薄錯誤顛倒之後往往 也還是錯的。通過慘痛的經驗教訓發現再不能用簡單化的「革命」、「規律」、 「目的性」等觀念來把握歷史時,其反面如「無規律」、「無目的」、「告別革命」同樣不能幫助我們準確地理解歷史,特別是不能假設歷史會按人們現在的設想,重新再來一次。這種價值逆反式的「重評」之所以值得引起注意,是因為一百多年來它是一再起作用的簡單思維模式。正是這種思想習慣導致中國人拋棄一種意識形態後立即投向另一種意識形態,令真正的開放的歷史批判意識無法形成。我認為,在歷史面前,研究者必須盡可能超越一切價值判斷,努力追求客觀理性精神。雖然重新理解中國近現代史不可能完全擺脱價值評估,但重評一定要建立在新的研究,和更為透徹全面的理解之上。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傾向是歷史敍述「以中國為中心」。自從70年代柯文 (Paul A. Cohen)提出以中國社會本身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後,「中國中心觀」一直是方興未艾的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的獨特性日益被人們重視。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新方向,因為即使是大陸史學,它在過去幾十年間採用的馬列主義史觀,無疑也是典型的西方話語。就是通過批判馬列主義而形成的種種新史學,也難逃西方中心的魔障。寫歷史離不開理論的模式,而解釋中國近現代史的關鍵是如何看待百年社會變遷,特別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當今一切社會變遷理論都以西方現代化作為參照系,學術界把握中國革命的基本概念也多源於西方獨特的經驗。如歷史學家用從法國大革命中抽出的概念來分析俄國十月革命,再把蘇聯革命模式用到中國。但是,這些基本概念能否抽離開它的母體,直接用於另一個形態不同的社會,則是一個長期受忽略的問題。

破除種種西方中心論,尋找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歷史解釋雖然是思想大解放,但是它也蘊含了另一個潛在危險,這就是古已有之的國粹主義和中國特殊論。在這種傾向下,以中國歷史的獨一無二和其與西方之不可相比,並進而排斥所有普遍理論,就會把中國歷史從世界歷史中孤立出來。我認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研究的正確方向是和國粹主義和中國特殊論主張相反的,其目的恰恰應當在於從中國社會的特殊經驗中抽出或概括出理論,以提供一種從西方經驗無法看到(或極易忽略)的社會變遷模式,深化社會科學對人類歷史普遍進程的了解。我們不可忘記:任何一種歷史觀都不可能沒有確定的世界觀作為背景。在傳統社會,中國人把他們的世界當作「天下」,自這種傳統的天下觀解體以後,取而代之的是唯物史觀。今天馬列意識形態的唯物史觀破滅了,很多中國知識份子突然發現自己對世界和中國的歷史的了解也隨之破碎,再無法構成一個完整的圖像。因此,重寫中國近現代史也應包括中國人有關世界史觀念的重構,即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社會變遷經驗能同西方對話的理論。

以上我對近年來歷史研究中的兩種傾向的看法,是見仁見智的個人觀察。 但我深感,藉此二十世紀最後五年之際,我們特別需要的就是批判的和開放的 歷史精神。

金觀濤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